

命

〔日〕柳美里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命 / 〔日〕柳美里著; 翁家慧译. — 2 版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9.6
ISBN 978-7-5442-4466-4

I. 命… II. ①柳…②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361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6-083

INOCHI by YU Miri

Copyright © 2000 by YU Mir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gakukan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U Miri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MING

命

作 者	〔日〕柳美里
译 者	翁家慧
责任编辑	翟明明
特邀编辑	杜益萍 张 苓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 山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层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
印 张	7.25
字 数	110 千
版 次	2009 年 6 月第 2 版 200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印 数	1—15000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466-4
定 价	20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献给已逝的东由多加先生

〔日〕柳美里 著
翁家慧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二〇〇九·海口

我在微明的晨曦中醒来。

既不像是被噩梦魔住，也并非因为睡眠太浅，更不是由于尿急或被什么声音吵醒。我觉察到体内发生了某种细微的变化，可能是身体在无意间觉察到了什么，而从睡梦中醒过来。

今天是五月二十四日。

这才想起，每年这个时候，我都送生日礼物给东由多加。但今年却因小说的截稿日期迫在眉睫，我竟将他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。墙上有一个留言板，上面用大头针钉着张便条，上写着：五月十二日，生日礼物。

我把好多东西都钉在留言板上，比如约稿的传真、欲购书籍的书评、感兴趣的新闻剪报，以及一些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想要的商品的目录。为了打理这些东西，每隔两三个月，就扔掉其中

的一半，把剩下的东西收到箱子里，等到年底大扫除的时候，再把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清除掉。一张发黄的剪报吸引了我的视线，那是一则关于“肺癌的基因疗法”的报道，日期是今年的二月二十五日。我并没有打算要写这类关于癌症和基因的小说，怎么就剪下了这么则报道？我把手贴在额头上，好像有点发烫。其实，几天前就开始有点发低烧，只是截稿前经常如此，也就没怎么放在心上。翻开记事本，一边确认校完稿之后的日程安排，一边瞅了一眼上个月的日历。四月二十五日，来例假。那到了五月二十一日、二十二日还不来，就有点怪了，可我身上却没有一点要来例假的征兆。我不禁浑身发冷。

睡到过晌，起来后就去附近的药店买了早孕试纸。回来一试，发现试纸的颜色并没有变化。又看了一下说明书，上面写的是例假迟来一周以上才能测出变化。我就又去了趟药店，把架子上所有的试纸都拿到收银台结账。我打算从此每天都测一遍。我确信，我是怀孕了。

怎么对他说呢？也许什么都不说最好。不管是生下来，还是拿掉，什么都不告诉他最好。我有一种预感，要是真的怀孕了，我和他之间也就结束了。

他是在某电视台做新闻的，现在三十五岁，已婚。和他初次相遇时，他身上没有任何已婚男人的味道，我以为他还是个单身汉。直到我们有了亲密关系之后，才知道他原来已有家室。那次

在床上，我问他：“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”他眨了眨眼睛，说：“我和老婆正闹分居呢。”以前，我也和有家室的男人交往过，每次总会让对方的妻子痛苦不堪。于是，我就对他说：“咱们到此为止吧，继续下去就会纠缠不清，反而更痛苦。”

然而，后来我们还是见面了。

我也知道应该离开他，但越想要离开，就越想见到他。我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，每天都见面。有时候太忙，就只约见三十分钟，一起喝茶。有时候我甚至苦苦哀求他：“就五分钟，什么地方都行，站着说会儿话也行。”一开始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，以为他和老婆已经分居。我把家里的钥匙给了他，还给他买齐了内衣、袜子、手帕、睡衣和剃须刀。要是他在我家过夜，第二天还得有可换的衣服，我就想给他买一套便装和一套正装，但他对此不置可否，含糊其辞。而且，他只穿过我给他买的睡衣，我才渐渐意识到，他所谓的分居只是一个谎言。但我仍然相信他所说的，他和妻子的关系已经破裂，五年没有夫妻生活，而且，离婚申请也已经写好了……我只是一味地相信，他们不久就会离婚，然后我和他就可以生活在一起。

我和他交往越深，就越发不能忍受他在我和他妻子之间保持的那种绝妙的平衡。于是，我不断加大每天服用的安眠药的剂量，整天都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，体重也下降到四十公斤左右。

“我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但一下子要离也离不了。”他说的这番话，我理解为：只要花上一段时间，婚还是可以离的。

枕边细语时，我还天真地对他说：“我想和你生个孩子。我不会给你添负担的。你要是想我们了，就一个星期一次，或一个月一次，来看看孩子就好。”

写作计划已经排到了两年之后，那些还没有影子的作品的版权，也早已被我预支了。我哪能生孩子呢？

他接下我的话，也开始编排故事：“咱们的孩子生下来之后，我想要每天都看到他，由我自己来抚养他。生活在父母健全的家庭中的孩子更幸福。要是一个星期或一个月才能见一次面，那我肯定会疯掉的。”

这次谈话是在四月底，没想到一个月后我居然真的怀孕了。这叫我怎么说呢？

校完最后一稿，小说便可付梓。那天，我拿出早孕试纸一试，色带变成了蓝色。我的低烧还在继续。犹豫再三，给他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有事要谈，问他晚上有没有时间。他竟有点吃惊地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我说“见了面再说”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我们在六本木碰头，然后一起进了酒吧。四杯 salty dog 下肚，我还是没法说出口。

回到我家，两个人躺在床上时，我说：“我可能怀孕了。”

“我猜也就这事。”他说完这句话就再没吱声。那天晚上，我

们俩什么都没做就睡了。自开始交往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第二天，我们俩好好谈了谈。那天并不是周末，但他没去上班。

“你像现在这样保持单身，不挺好的吗？”

“我也拿不定主意。但我要是生下来，是不是就只能分手？”

“怀孕就分手，这也太可笑了。”

“但我们只能分手。”

“为了咱们俩考虑，还是拿掉吧。”

我想哭，就像一般的年轻女孩子那样哭出来。这时，眼泪真的流了下来。

他是记者，曾经采访过难民营，我一向以为，不论怎么说，他都应该算是一名开明的人权主义者。如果他求我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可能就会去拿掉。但是，他现在的说法却让我觉得很滑稽。我反问他，拿掉孩子是不是有悖于他的信条。

也许是记者的良知唤醒了他，他立刻坚决地说：“我明白了。首先应该考虑孩子的生命。”

夕阳西下，房间里暗了下来，但谁也没有开灯的意思。

他背对着我，说：“我一定会想办法和她离婚的。要真是离不了，我也只能请你原谅了。可是，我也想要自己的孩子，想跟你一起把孩子养大。从今以后，我这辈子都会争取和她离婚。”

第二天，他又留下来过夜。

“既然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那你就不能抽烟喝酒，也不能熬夜。现在手头还有什么工作没做完？”他问我。我就把日程表拿出来，告诉他，还有截稿、碰头会、会餐什么的。他立即作出裁示：这个还是回绝了的好，这个没问题，要是会餐实在推不了，就不要喝酒。那口气简直就像个准爸爸。

六月十三日，星期日。我因为出血住进了广尾的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。预定十四日在《新潮45》杂志社和小泉纯一郎的对话访谈也只好取消了。

家里还有一大堆事要做，接收邀稿的传真、收发邮件、洗衣服、给植物浇水等，都得请个人来帮忙。我本想把怀孕的事告诉妹妹，叫她过来。但他却说：“现在先别告诉别人，这些事我来做好了。我现在还不好意思见你妹妹，你先别告诉她。”然后，他就一直住在我的公寓里。我开始有妊娠反应的时候，医院里的饭菜根本难以下咽。他每天早上都会打电话过来，问我：“想吃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想吃蛋筒冰激凌。”他就会在冰激凌融化之前飞快地给我送过来。医生和护士来巡诊时，他也表现得像丈夫一样自然。

我依旧困惑不已。一边焦急万分，想要早点动手写和角川书店签约的长篇小说，一边又不想放弃这幸福的感觉——这是我有生以来体验到的最甜美的生活，这是一个女人孕育她所喜欢之人的骨肉时感到的幸福。这两种情绪深深地困扰着我。

要是在以前，每逢周末，他连个电话都不会打过来，但现在却每天都来医院看我。于是，我就以为他的离婚谈判应该正在进行之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因为他妻子从六月上旬就去国外出差了，有三个月时间都不在家。他从没告诉过我，他妻子是做什么的，我也不想打听。篡改事实是谎言，隐瞒重要的事也是谎言。

六月二十二日是我三十一岁的生日，也是我的处女作《石头上游泳的鱼》接受判决的日子——我因写了这部小说被起诉侵犯隐私和毁坏名誉。我担心得不到外出的许可，就一直都没有和主治医生说起这件事。直到这一天他来巡诊，我鼓足勇气向他说明了情况。没想到大夫态度坚决地说：“就因为上是上法庭，更不能允许你外出了。万一要再出血，怎么办？我给你开证明，你还是不要出席了。”

“估计判决可能对我很不利，要是我把记者见面会也给取消了，就会被认为是在逃避。”

大夫看了看旁边的护士，然后对我说：“那你就坐轮椅去，让护士陪着你。”

“不行，我不愿意坐着轮椅去参加记者见面会。我会坐出租车去，见面会一结束，马上打车回来。”

记者见面会那天，我好不容易撑到最后，回到医院，在病房中看电视里有关判决的报道。我的作品成了战后第一部被禁的小

说。我备觉震惊，这实在是最坏的结果。不过，因流产先兆而住院的事居然瞒过了所有人，我不禁放下心来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给我买了份报纸。看着上面的照片，他有些不安地说：“你这肚子已经很明显了。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睡不着觉，把他前前后后说过的话拼凑起来一想，才明白这婚恐怕很难离得了。他只不过一直在编故事而已。他要是不想离，我也不打算逼他。我只想弄清楚他对我的感情。他到底爱不爱我？是不是真的期待着我们的孩子出世？或者，他是不是在内心深处诅咒着孩子？我想弄清楚这一切。

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卷入了滚滚洪流之中，巨大的不安正在将我吞噬。我在散文或访谈中，总是果断地说写作就是我的生命，但现在，却觉得文字已没那么重要了。我只觉得害怕，想要有个依靠。

出院前一天，他来病房，我贸然对他说：“还是拿掉吧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住院？”

“一个人带大孩子，我没这个自信。咱们还是分手吧。你把钥匙还给我。”

“我求求你，给我生个健康的宝宝。可能我这辈子就这一个孩子了。”

“把钥匙还给我！”

“绝不！我要是还给你，你就会把孩子拿掉。”

我们俩吵了起来。

“那好，还给你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不拿掉孩子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了我家的钥匙。

就在那时，不知从何处传来新生儿的啼哭声，接着，走廊里响起了护士们忙乱的脚步声。这呱呱的啼哭仿佛是在责备我，要给我定罪似的，又像是把我从纠缠不清的烦恼中拯救出来一样。婴儿的第一声啼哭——这悲伤、甜美而有力的声音，一直在我耳畔回响。

我把柜子里的冬衣全部拿去干洗店，再把夏天的衣物都放进去，之后，突然想要给好久没有联系的东由多加打个电话。

东由多加是东京 Kid Brothers 音乐剧团的剧作家兼导演。对于比我小的那一代人而言，它基本上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剧团。不过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它却极其受欢迎，不仅有很多铁杆观众，还在日生剧场、新宿驹剧场、后乐园大帐篷、日本武道馆等地方举行过公演，甚至还到过美国和欧洲。我十六岁那年，也就是一九八四年，作为进修生加入剧团，在那儿一共待了两年。

很难解释东由多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有时，他看起来就像怪物似的，内心非常复杂；有时看上去又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，而且非常贪玩。周围的人都把他当作一个孤独、滑稽的小王

国的暴君。

从十七岁开始，我和东一起生活了十年。

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和各自的亲人生活的时间还要长，因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即使在分手之后，也一直保持联系，每个月总会打一两次电话，或见个面说说话。

我一直想和他谈谈，和他商量一下生不生孩子的事，但到最后也没说出口，只是像往常一样，话题总围着彼此最近的生活打转。

聊到最后，我正要挂电话，东突然说：“我吃东西老是卡在喉咙这儿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我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捏紧了话筒。

“以前到第二天就没事了。这次一连两个礼拜都这样。大家都叫我去看医生，但我怎么也不想去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再见。”东用他那明快的声音向我道别，并挂了电话。

我想起发生在一九九五年二月的一件事。

那次晚饭吃到一半，东被生姜烧肉片卡住，跑到卫生间里去了。等他回来后，我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他用手按着胸口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卡在这儿，吐出来就没事了。”

如果饭前没有听说高桥昌也的事，我也不会这么留心。高桥昌也是 Saison 剧场的艺术总监，同时也是演员兼导演。大约两三个月前，高桥考虑让我写剧本，然后在 Saison 剧场演出，于是我

们约在剧场楼下的餐厅见面。当时，他刚刚动完食道癌的大手术。他告诉我，一开始老是有食物堵住喉咙，虽然他觉得挺奇怪，但也没有怎么去管它。将近一年之后，就什么都吃不下了，到国立癌症中心中央医院一检查，才知道是得了食道癌，而且还错过了做手术的最佳时机。不过最后，高桥还是去做了手术，而且手术竟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。此后，高桥在戏剧界的第一线变得更加活跃，但也常常为自己一年前没有去就诊感到追悔莫及。

那晚吃完饭回家后，我给高桥发了一份传真：“我的朋友东由多加出现了和高桥先生一样的症状，如果可以，希望能到国立癌症中心做检查，您是否愿意帮我介绍一下？”高桥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然而那时，我和东的关系并不稳定。其实，早在一年多以前，我和他之间就已出现裂痕。我们相识之时，东是剧团制片人，我则是进修生。后来我离开剧团，他还是像导师一样，继续不断地影响着我。我渐渐地感到这种威慑和束缚，生活也逐渐变得苦闷起来。一心都在考虑早日独立出去，却没有勇气亲口说出“分手”二字。取而代之的是，每天买醉到次日清晨，游走于不同的朋友和男人的房间，希望借此得到片刻的自由。

就在和癌症中心约好时间的前一天，我明知道该回家，却还磨磨蹭蹭，不停地喝着酒，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在男人的房间里醒来。约定的时间是十点，快点去应该还能赶得上，于是我匆忙

穿上衣服，坐上出租车飞奔而回。到公寓时，刚好过十点。

东坐在客厅的桌子旁看书。

“赶紧收拾啊！”我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你以为现在几点呢！都这时候了，还去什么！”东冷冷地说，眼睛一直盯着书。

我知道是自己不对，也无可反驳。但是也不好再求高桥先生帮忙，只好算了。

就这样，过了五个月。有一天，我搬出了东的公寓，开始了独居生活。

为什么那天晚上没有回去呢？直到现在，我也想不明白。是我太轻率，以为他绝不会得癌症？还是在无意识之中害怕被确诊是癌的话，我就一辈子都无法离开他了？或者是想故意惹他生气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手了？但是，那种对于“就怕万一”的恐惧，就像癌细胞一样，开始在我的心底深处蔓延。

我放下电话，感到茫然。不过，意识深处，我确信，他这次一定是得了食道癌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又打电话问他：“你想不想看伊力·卡赞的《自传》，分上下卷，有点长，不过很有意思。”最后，我们约好下午四点他来我的公寓。

他到后，我感觉有点难以启齿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开个头，让